

论公元4—9世纪拜占廷帝国圣徒崇拜

张日元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市 300071)

摘要:圣徒崇拜缘起于犹太教与早期基督教的信仰与仪式,是基督教信仰体系中最具活力的民众信仰。公元4—9世纪,圣徒崇拜盛行于拜占廷帝国。其因在于:一方面,它迎合了当时民众的精神和世俗需要;另一方面,它接纳了传统异教习俗,同时教父们对此采取了务实的“宽容”态度。因此,圣徒崇拜本身体现了基督教信仰的传统与发展、世俗性与神圣性共存的特点,是认识基督教信仰的一扇重要窗口,也是理解基督教能够战胜传统宗教的一个新视角。

关键词:公元4—9世纪;拜占廷帝国;圣徒崇拜;基督教

中图分类号:K5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9)06-0182-05

公元313年《米兰敕令》的颁布,成为基督教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基督教获得了合法宗教地位。这样,自公元4世纪起,基督教公开与异教展开了长期的相持、竞争,直至公元9世纪第七次大公会议基督教正统教义的最终确立及异教的基本销声匿迹。在这个过程中,统治阶级的支持显然是基督教得以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其自身的发展则是更重要的一个因素。在基督教自身的发展中,圣徒崇拜是其最活跃因素,体现了基督教发展的重要特征。然而,从圣徒崇拜这一视角来探讨公元4—9世纪基督教的发展,仍然是一个新课题^①。因此,通过圣徒崇拜研究,来考察这个时期的基督教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圣徒崇拜渊源及界定

圣徒崇拜源远流长,据盖菲亚(B. de Gaiffier)所称,圣徒崇拜源自于犹太教(Jewry)与早期基督教的信仰与仪式^{[1]Introduction 14}。在犹太教中,犹太人崇拜高级神职人员、预言者与殉道者,并于他们埋葬之地建立纪念碑。基督徒对于他们自己的圣徒也继承了 this 仪式,早在公元1—2世纪,基督教徒就已开始把受罗马帝国迫害致死的“殉教者”奉为“圣徒”,并公开崇拜。因为“殉教者”在基督教中意指见证者,如使徒是基督复活的见证者;他们被认为具有天启能力,死后可直接上天堂面见上帝,并被授

予白色长袍;他们之所以成“圣”,是因为他们紧紧仿效基督——作为父对人类之爱的见证者而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为所有基督徒树立了一个榜样^{[1]Introduction 14}。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圣徒”的范围不断扩大,除了为信仰而献出生命的“殉道者”以外,还包括那些虽寿终正寝但却“圣洁贤明”的教父、主教、传教士以及俗世之人。

大约在公元1—10世纪,圣徒崇拜基本上只是地方教会的一种自发行为,圣徒崇拜的确立是基于地方民众的赞同,无需经历什么“封圣仪式”^{[2]315-331};地方主教的认可及圣徒遗体被迎入“崇拜之所”是圣徒得到崇拜的关键。很早的时候,行奇迹被认为是具有神圣性的证明;圣徒、圣物被认为既具有治病之神力,又能给供奉它们的教堂提供保护。慢慢地,封圣之权归于教皇。一般认为,教皇“封圣权”萌芽于10世纪末,但教皇真正开始全面行使“封圣权”是在12世纪70年代,即教皇亚历山大三世(1159—1181年)统治后期^{[3]189}。此后,教皇指派调查团去调查圣徒人选的生平与奇迹,作为封圣的依据,此两项调查内容持续至今。事实上,直到中世纪晚期,非正式的地方圣徒崇拜并没有完全停止^{[1]Introduction 17-18}。

天主教圣徒的官方定义是“教会以正式的礼拜仪式赐予荣耀的人”^{[4]193}。教皇册封圣徒的依据是 both virtus morum and virtus signorum(品行高尚与行奇迹)^{[5]8}。当然,生者不能成为圣徒,成为“正式崇拜的对象”。只有

^① 目前国内关于圣徒崇拜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国外有关圣徒崇拜著述较多,但主要注重于圣徒传的整理、编纂,而从历史的角度对圣徒崇拜进行研究,国外学者虽有所涉猎,但还没有引起重视。

收稿日期:2009-09-10

作者简介:张日元(1970-),男,山东高密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泰山学院历史系,讲师,主要研究世界中古史。

死者才能成为圣徒,正如 A·M·克雷伯格(A. M. Kleinberg)所言:教皇或其他的人不可能给予活着的人以圣徒称号,因为人们永远不可能确知该“圣徒”将来的活动,而圣徒身份是以将来不断显示的奇迹为根据的^{[5]6}。所以,圣徒身份往往是被后人追封的。

事实上,圣徒首先且最主要的是地方圣徒。相对于正式的圣徒,地方圣徒具有同样的普遍性;在民众眼中,两者毫无区别^{[4]194}。而在对圣徒的历史研究中,历史学家判断圣徒身份的一个最重要依据是,该圣徒是否拥有超自然力量;当然,圣徒美德也是一个重要根据,因为超自然之力也可能被其他非圣徒所拥有,例如巫师与恶魔等^{[5]8}。所以,“公元 8—9 世纪的拜占廷圣徒传记通常由传统奇迹、征兆、传奇故事和道德告诫构成”^{[6]10}。

在本文中,笔者对圣徒的界定采用以上历史学者的标准,即既具有行奇迹能力又拥有基督美德而深受民众欢迎的人。这样,公元 4—9 世纪拜占廷帝国的圣徒则包括殉教者、圣者(divine men)和获得正式教会组织所认可的“圣徒”。

殉教者常被看作为第一代圣徒。对于他们的崇拜,最初是发生在埋有圣徒遗骨墓地的地方崇拜。吉本对此有一段精辟的描述^{[7]64}:

殉教者的坟墓是永恒的舞台,出现不计其数的奇迹……。祈求者的信心植基于坚定的理念,这些与耶稣共同统治世界的圣徒,会用怜悯的眼光注视大地,相信他们一直在关怀着正统教会的繁荣兴旺。任何人只要效法他们的忠贞和虔诚,就会受到他们的照顾,成为特别关怀和宠爱的对象。

自从早期教会规定,每个神圣教堂的圣坛上都应供奉一件圣物后,圣地的范围便进一步扩大。但直到公元 4 世纪后半期,有关殉教者圣物及其具有神奇力量的文献少、且默默无闻。第一个被记载的圣徒遗物转移事例是关于圣徒巴比拉斯(Babylas)的,发生于约公元 3 世纪中期^{[8]132}。随后,有关类似事例激增。在君士坦丁大帝改变信仰之后的年代,无论是皇帝、执政官和军队的将领,都会很虔诚来到渔夫和帐幕工的墓前致祭。受到人们敬仰的骨骼被安置在耶稣的祭坛之下,帝国都城的主教不断供奉非杀生的祭品。东部世界的新都城无法提供古老的纪念物,就向所属行省大力搜刮,因此也显得相当富有。

第二代圣徒,不是殉教者,而是因其一生虔诚地献身于上帝的崇拜而分享上帝神性的人。其前身可远溯至埃及或巴勒斯坦地区,东部地区的民众总是愿意认可并接受在他们面前出现的活生生的圣者^{[8]134}。

君士坦丁大帝后期,圣安东尼(Antony,大约出生于公元 251 年,基督教修道制度的奠基人)的口头传记开始

在人们中间传播,于是,第二代圣徒的形象在一些信徒心中慢慢确立。因为在当时,口头传播通常是最有效的宣传媒介。这样,当异教信仰衰退之时,这些新的基督教英雄便如殉教者一样受到信徒的膜拜与效仿。从公元 4 世纪下半叶起,具有相似性情的人成为帝国东部地区非常著名的一部分苦行者。“这些苦行者通过其生活方式和人数的急剧增加,在教会史上占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8]135}

这些禁欲苦行圣徒除了满足其自身的性情与虔诚需要之外,他们还与殉教者圣徒一样满足了周围民众的需要。因此,圣徒之所以会受到崇拜,其因就在于他既满足了当时民众的精神需要,又为他们提供了现实帮助。

二、圣徒崇拜功能

公元 4 世纪的拜占廷帝国,来世的焦虑和现世的无奈困扰着人们。这个时期,冥世观还没有成为拜占廷宗教思想的主题。在当时一般人的观念中,人死后的世界还由魔鬼主宰着,并且魔鬼的存在形式变幻莫测。有时,魔鬼是看不到的,只是让人们感觉到其存在,或听到其声音;有时,它们会以其他的形象出现,例如一条黑狗、一只老鼠、一名埃塞俄比亚巨人,或者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事物。它们可以引发意外事故或病痛,使人犯罪,并陷入魔鬼附体的异常状态。即使没有出现魔鬼的干预,人们仍然会受到现实生存环境的困惑:恶劣的气候或者蝗灾威胁着庄稼,瘟疫流行使人大量死亡,未来威胁无时不在,一片黑暗。“人能够得救吗”困扰着当时的人们^{[9]98}。

“在拜占廷早期艰难岁月,拜占廷人逐渐开始转向虔诚崇拜圣徒,例如日益深入人心的圣乔治(St George)和圣迪米特里(St Demetrius),他们超凡脱俗的形象由于拜占廷人和斯拉夫皈依者的笃信虔诚而提升,逐渐脱离了他们原来所处的地区。”^{[10]120}正如吉本所言:“圣徒的出现恰逢其时,他们顺理成章地来到人间,治愈疾病、扶助羸弱、给饥者以饱食、赐庄稼以丰收,并且能够预测未来,简而言之,他们恰好依照《福音书》中记载的基督显圣的方式来行使神迹……。”^{[11]640-641}因为圣徒既能上达天庭,又能入世为俗;既能行奇迹,又能干涉日常俗务。

人们经常前往殉教者墓地,祈求身体健康,疾病治愈;让他们不孕的妻子多生孩子,或让他们的孩子平安、幸福。在他们要进行任何长途或带有危险性的旅行时,他们总是请求神圣的殉教者一路指引和保护他们;如果回来后一路平安,他们通常会怀着无限感激之情匆匆赶到那殉教者墓前,表达他们对这些保护者的虔诚崇拜。在对殉教者神圣力量的宣传中,一位名叫狄奥多莱(Theodoret)的主教曾记录了一些早期殉教者神奇治病能力的事例,这些都发生于他所最熟悉的帝国东部地区。他采用人体各部位的模拟像,以此指出恳求者患病之处,

及证明它们的恢复状况。在西部地区，保利努斯(Paulinus)自豪地指出圣菲利克斯(Saint Felix)的圣坛墙壁上布满了这样的模拟像^{[8]133}。

拜占廷帝国早期，圣徒的声望建立于他在不断需要帮助的人之间所作的艰苦、谦卑工作基础之上。圣徒通过禁欲苦行战胜自己的欲望，获得了战胜魔鬼的力量，于是能够克服魔鬼所操纵的疾病、天灾及其他灾难。他的祈祷能够为最胆怯的信徒打开通向天堂之门^{[12]ix-xii}。

对于其职责，比德·布朗认为：其一，就是将遥远的上帝与人类需要的特殊性联系起来。因为圣徒来自于人，容易因怜悯而流泪；同时他又是希伯来先知的继承者。其次，圣徒是一个“业余者”世界的专业者。他能够以其特殊“法力”为求助于他的人提供安全而有效的帮助。其三，圣徒是时人焦虑的重要缓解者^{[9]97}。

公元5—7世纪是这些“圣徒”声名显赫的岁月^{[10]121}。他们在这个社会转型期以及其后的动荡岁月里，都发挥着重要的社会作用。这些苦行隐修者随时将他们对世俗事务的影响从乡村或隐修地自由地扩散至全社会。社会各阶层人士对苦行隐修者趋之若鹜，他们争先恐后地来到距安条克不远的石柱隐修者大西蒙(Symeon the elder)身边，来到首都郊区的丹尼尔(Daniel)身旁朝拜。即使圣徒死后，他们依然可以通过其下葬的坟墓产生强烈影响。“对圣徒的狂热崇拜，无论是活着的，还是已经死去的，同样都使圣像崇拜进一步升温。6世纪末和7世纪流传的一些极具教化意义的传说，使人们相信圣像具有超凡的能力，不仅能够保护人类，而且可以直接干涉人类的一切公私事务。”^{[10]179}

对于一切公私事务的干涉，活着的圣徒更是如此。如公元4—5世纪的叙利亚乡村地区，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经济的发展，庇护者成为乡村中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他能够帮助村民处理与外界的关系，会为村民提出诉讼，能够解决与其他村民间的世仇，能设法帮助他们完成而不是逃避赋税。庇护者与其村民之间的纽带因其不断提供的服务而得到加强。利巴纽斯(Libanius)描述一个好的庇护者：他是一个能够圆满解决乡村生活中出现的棘手问题的人，他能为村民提供宝贵的水源并进行分配，他会设法取消债务，他能够当场平息村民间的争执，因而使他们免于到当地城镇上诉的跋涉之苦。承担这样的服务是耗时费力的，所以利巴纽斯和许多居住在城市的大土地主对他们所承担的这样的庇护角色仅仅体现在口头上，他们不会抛弃舒适的城市生活而去乡村提供庇护者的服务^{[9]85}。这样，庇护者的角色便落到了客观公正的“陌生者与神圣者”——圣徒——身上，他们身体力行，有效地承担了这一责任。

对于叙利亚的农夫，圣徒是一个领导者；对于城镇居民，他是一个客观公正的陌生者；对于无数个人来说，他

又是在这个动荡俗世中值得依赖的“帮助者”。公元7世纪，一个被称为施舍者约翰的宗主教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及其周围建立了许多慈善机构。他的传记作者将他的行为记录在下面的这段文字中：“有一次，这个城市正在经历一次严重的饥荒。这个圣人的同事们马不停蹄地将金钱和赠物分发给那些需要的人。一些贫穷的妇女得以胜过了饥饿，但是由于分娩的临近，她们腹痛、脸色苍白，被难忍的苦楚所折磨，她们被迫向分发物品的人紧急求援，当这个传奇人物被告知这些情况时，他在这个城市的不同地区建立了7个分娩医院，在每一个医院安排好40个床位，并预备好使每一位妇女在分娩后能在这些医院里安静地休息7整天，然后给她们每人三分之一 nomisma 让她们回家。”^{[13]58}

公元8、9世纪的拜占廷帝国，由于外敌的入侵和社会的动荡，圣徒更加活跃。在当时，圣徒是民众所崇拜的行奇迹者、治病者、和传教者这一类人当中最受欢迎、且最正统的那一些人。当圣徒的名声传播开来，人们就会聚集到他周围，他被视为一位法官和民众领袖^{[14]234}。他们表现为圣者、隐修士和修士，经常长途跋涉，从一个城市走到另一个城市，或从一个隐修中心走向另一个，伴随着布道、提供建议、预言、治病或仅仅是招待一群崇拜者。与前几个世纪相似，在一个农业社会的背景下，这个时期圣者所行奇迹基本上也是面向乡村的穷人。这些奇迹包括：求雨的祈祷、拯救庄家于蝗虫灾或鼠灾，在沿海地区驱逐引起船难的幽灵、将邪恶的龙和大蛇从洞中赶出，以及解放邪恶神灵控制的异教圣地和温泉。

由上所知，圣徒之所以会受到信众的崇拜，一个重要因素是它迎合了当时人们的精神和现实需要。而另一个重要因素也不容我们忽视，那就是它对异教传统的吸收与改造，及教父们对其所持务实的“宽容”态度。

三、圣徒崇拜与异教习俗

对于圣徒崇拜与异教习俗之间的渊源，吉本在其名著《拜占廷帝国衰亡史》中有一段精彩的评述^{[7]65}：

要是德尔图良(Tertullian)和拉克坦提乌斯(Lactantius)在5世纪中叶从死中复活，协助料理圣徒或殉教者风行一时的庆典，看到亵渎神圣的景象一定大为吃惊而悲愤不已，因为完全取代基督徒会众纯洁而属灵的礼拜方式。等教堂大门打开，香火弥漫、鲜花香气及中午的灯火和烛光，不仅庸俗而多余，还发出渎神的光芒，这些都让他们感到厌恶。

公元6世纪中期吕基亚(Lycia)地区的如下场景进一步见证了吉本的感慨：

普莱尼奥斯(Plenios)地区的神职人员与虔诚的信众一起，吟唱着赞美诗，高举着神圣

的十字架,向[圣乔治](St. George)礼拜堂列队行进,在那里与上帝的仆人尼古劳斯[Nikolaos]会合。尼古劳斯与信众一起走进礼拜堂,跟随他们的还有七头小牛,他用这七头小牛作为献祭,信众聚集到一起,一共有二百人。上帝的仆人得到了一百份葡萄酒和四十份麦饼,于是每个人酒足饭饱,并感谢赐予其仆人尼古劳斯荣耀的上帝。^{[8]135}

在这个基督教圣徒崇拜的仪式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了“杀牲”、“宴会”和“饮酒”等熟悉的异教影子。

圣徒提供“帮助”的方式中出现异教习俗也屡见不鲜。例如在当时,各处的圣徒墓地都能产生各种治病的力量,甚至生长于其附近的野草也具有这种神奇力量。同样,圣徒墓地的尘土也具有类似的神奇力量。皇帝查士丁一世(Justinian I)和莫里斯(Maurice)就曾派有关主教到圣季米特里奥斯(Saint Demetrios)的墓地去取这样的神圣尘土。事实上在异教时代,早期的信徒在其庙宇中就有这样的习俗,并有时将圣所石墙的尘土刮下来作为圣物。在埃及,这个习俗一直持续到基督教时代;即在那里一直持续到公元4世纪。圣徒通过其埋葬之地的尘土行奇迹的描述,在时间上贯穿于公元4至8世纪及其以后的圣徒传记中,在地域上遍布于从美索不达米亚到日耳曼之间的广大地区^{[8]131}。

下面的两则事例更是“淋漓尽致”的展现了圣徒崇拜与异教习俗之间的渊源。在东部行省地区,公元4—8世纪期间,在异教传奇故事中有一个圣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的圣人,这位异教徒曾经驱除过瘟疫、冰雹和暴风恶魔,“驱云者”的绰号表明了他拥有操纵云的力量,于是从公元4世纪直到7世纪末的基督教会议再三地禁止将这类人归为神圣者。在同一历史时期,甚至还要晚一些,西部的宗教会议也发布了同样的决议^{[8]138}。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锡肯的西奥多生平》(Life of Theodore of Sykeon)中记载有这样一个故事:^{[12]126}

有一个叫雷克(Reake)的村庄,在其天空有一块残暴的乌云不时光顾其田间,当葡萄成熟之时带来冰雹;因而村子里的人处于困境之中,很长时间以来不能收获任何已成熟的作物。因而他们将行奇迹者锡肯的西奥多从修道院中请了过来,希望他能行“驱云”奇迹。于是他绕着葡萄园地、村庄绕了一圈,伴随着祈祷,并在其边界的四角上插上了四个木十字架,然后离开村庄回到了修道院;通过他的神圣祈祷,凶恶的黑云再也没有光顾这里。为了报答这位圣徒,这个村子的人每年都要给这个修道院送去一定数量的葡萄酒和葡萄。甚至异教圣地直接摇身一变成为基督教崇拜圣地的

现象也不足为奇。雅典的阿斯克里普斯(Athenian Asclepius)圣地几乎没有经过什么改变就成为了一座基督教堂;在法兰克地区,当地主教在一位女神掌管的湖边建立了一座圣希拉留(Saint Hilarius)礼拜堂,并把这个名字改为希拉留^{[8]132-133}。考古证据也表明了这一事实。公元7世纪初,马达巴的人们(the people of Madaba)在以利亚教堂(Elijah)的地面上用镶嵌字母写道:“先知,您接受我们的祈祷,借上帝之力为我们带来了雨水,使神恩照耀着不幸的我们,请您记着这个谦卑之城的奉献。”在这片干旱的土地上,以利亚已经成功替代了以前的异教天神^{[15]143f}。

面对上述这种圣徒崇拜与异教习俗之间的渊源,公元4—8世纪的教父们则采取了灵活而“务实”的态度。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与信仰传统下,无论何处,生活需要行奇迹者,如果不是生活需要,那么希望也需要奇迹。人们对行奇迹者的选择只是在于他们所提供的方式,基督教的或非基督教的。“主教们决心提供一个基督教的答案,为了他们的信众,无论行什么样的奇迹。”^{[8]138}

于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异教崇拜圣地被“接受”,但信徒前来朝圣的神圣不再是罗斯莫特(Rosmert)和任何异教神灵,而是上帝及其圣徒。同样,整个帝国内许多圣地——雅典(Athens)、迦太基(Carthage)、麦努西斯(Menuthis)和菲莱(Philae)——的庙宇都改建成了基督教堂。所以,我们应该坦率的承认,正统基督教会的神职人员也效法异教徒所采的模式,那些都是他们过去急着要摧毁的东西。就是最受尊敬的主教也不由自主地相信,那些无知的乡巴佬,要是在基督教内部找到与异教相似之处,等于获得一点补偿,就会感到自鸣得意,情愿放弃异教的迷信。”^{[7]66}

“事实上,正是主教创造了(invent)殉教者。”^{[16]187}

而且,有的主教本人也行治病奇迹,甚至在去世后仍能够提供这样的奇迹。例如,大量残存的圣徒传记就记载了这样的事例:在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地区,病人恳求巴西尔(Basil)行奇迹治愈他们,马丁(Martin)在法兰克地区,塞维利努斯(Severinus)在努克姆(Nouicum)地区也行类似奇迹;在西里尔(Cyril)时代的亚历山大里亚地区,有一个叫聂斯脱利(Nestorios)的圣徒,他拥有预言能力,而且每年要进城一次为病人提供奇迹帮助。圣奥古斯丁及其他教会的高层人士也亲身见证神圣的治病奇迹;一些有教养的教会人士还坚信圣徒具有严厉的惩罚力量^{[8]133-134}。

所以,圣奥古斯丁也认可刚入教的基督徒在其礼拜仪式中应允许拥有一定的自由。公元5世纪初,圣杰罗姆(Jerome)也有相同的认识:用异教的方式崇拜圣徒要强于对圣徒的无动于衷^{[8]155}。

结 论

综上所述,公元4—9世纪期间,源起于犹太教信仰与仪式的基督教圣徒崇拜不但为当时拜占廷人们的焦虑心态提供了精神上的安慰,而且还提供了世俗的帮助;圣徒实际上是一个“神圣”的世俗者,而非完全是一个“虚无法力”的崇尚者。同时,圣徒崇拜对一些盛行的异教习俗予以接纳和改造,维护正统教义的教父们对此也采取了务实的“宽容”态度。

所以,圣徒崇拜本身体现了基督教信仰的传统与发展、世俗性与神圣性共存的特点,是认识基督教信仰的一扇重要窗口,也是理解基督教能够战胜传统宗教的一个新视角。正如学者彼得·布朗在其名作《古代晚期圣者的兴起与功能》^{[9]380-101}一文中所持观点,仅仅将圣徒的角色阐释为卑贱者和受压迫者的帮助者的观点是不够的,圣徒的兴起是晚期古代的宗教革命,拜占廷帝国晚期基督教的胜利并非上帝对其他神灵的战胜,而是人类超越其过去制度、习俗的观点。

“基督教注定在最后胜出,因为它为所有那个动荡时期深切关心和想要解决的问题提供了答案,而这些答案无与伦比地简单,并明确有力地表达在一个令人难忘和使人信服的完整体系中。”^{[17]177}

参考文献:

- [1] David Farmer.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Saint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 [2] H. delehaye. *Les Origines du Culte des Martyrs*[M]. Brussels, 1933; W. Rordorf. *Aux Origines du Culte des Martyrs*[J]. *Irenikon*, no. 46, 1972.
- [3] 陈文海. 中世纪教廷“封圣”问题研究——对“封圣”过程的非宗教层面考察[J]. *中国社会科学*, 2002(4):189.
- [4] Stephen Wilson. *Saints and Their Cults*[M]. Cambridge, 1983.
- [5] A. M. Kleinberg. *Prophets in Their Own Country*[M]. Chi-

cago, 1997.

- [6] K. M. Ringrose. *Saints, Holy Men and Byzantine Society, 726 to 843*[D]. Rutgers University,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 Ph. D., 1976.
- [7] (英)吉本·拜占廷帝国衰亡史③[M]. 席代岳译.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8.
- [8] R. Macmullen. *Christianity & Paganism in the Fourth to Eighth Centuries*[M].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9] P. Brown. *The Rise and Function of the Holy Man in Late Antiquity*[J]. *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Vol. 61, 1971.
- [10] (法)罗伯特·福西耶·陈志强,剑桥插图 中世纪史(350—950年)[M]. 崔艳红,等译.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6.
- [11] (英)爱德华·吉本·拜占廷帝国衰亡史(上)[M]. 黄宜思,黄雨石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
- [12] Dawes and Baynes (trans.). *Three Byzantine Saints*[C]. Stvladimir's Seminary Press, 1977.
- [13] (英)玛丽·坎宁安·拜占廷的信仰[M]. 李志雨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14] V. Saints David, Symeon, and George[C]. See K. M. Ringrose. *Saints, Holy Men and Byzantine Society, 726 to 843*[D]. Rutgers University,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 Ph. D., 1976, p. 82.
- [15] P.-L. Gatier. (ed.) *Inscriptions de la Jordanie, 2: Région centrale (IGLS)* [M]//Paris 1986. See R. Macmullen. *Christianity & Paganism in the Fourth to Eighth Centurie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38.
- [16] B. Beaujaid. *Cités, évêques et martyrs en Gaule à la fin de l' époque romaine*[J]. *Les fonctions des saints dans le monde occidental (IIIe-XIIIe) siècle. Actes du colloque...* 1988, Rome 1991. See R. Macmullen. *Christianity & Paganism in the Fourth to Eighth Centuries*[M].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32.
- [17] (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君士坦丁大帝时代[M]. 宋立宏,熊莹,卢彦明译. 宋立宏审校.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6.

责任编辑 张颖超

An Analysis of the Cult of Saint in Byzantine Empire in the Fourth to Ninth Centuries

ZHANG Ri-yuan

(College of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The Cult of Saint originates from the faith and rite of the Jewry and the early Christianity. It is the most active popular faith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It was very popular in Byzantine Empire in the Fourth to Ninth Centuries. The reason lies in two facts. On the one hand, it met the needs of the spirit and the world. On the other hand, it adopts the traditional conventions of the paganism. At the same time, the Christian Fathers accepted it without strong opposition. So the Cult of Saint itself demonstrated the character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tradition and development, lay and holiness. It is an important way to understand the Christian religion, and also a new approach to apprehend the conquering of the Christianity over the traditional religion.

Key words: the Fourth to Ninth Centuries; the Byzantine Empire; the Cult of Saint; Christianity